

本书被美国社会学学会评为“2001~2003年亚洲问题最佳著作”

韩国工人

——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韩] 具海根 著
Hagen Koo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KOREAN WORKERS

本书被美国社会学学会评为“2001～2003 年亚洲问题最佳著作”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

韩国工人

——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韩〕具海根(Hagen Koo) 著

梁光严 张 静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序 言

我开始写作本书时，是把它作为一项从宽广的社会学视角对韩国发展进行的研究来着手的，集中关注的重点是快速工业化的社会文化维度。我对这一进程中的阶级动态，对社会各阶级塑造韩国工业化转型模式的方式尤其感兴趣。沿着这些思路，我写过几篇文章，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对于一本书而言，我探讨的现象过于庞大。我还发现了产业工人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在这方面文献中人们对他们的体验的关注是多么的稀少。更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韩国工厂工人曾经遭受过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对待，并发现了他们对压制性权力表现出的惊人反抗精神。我意识到，他们为争取社会更公正的斗争值得大书特书，因为他们的经验和反应可以说是 20 世纪 60~90 年代韩国工业化转型的核心。

尽管我自己已经确信，写一本有关韩国工人阶级的书是非常值得一做的项目，但我还是有相当多的犹豫，因为我曾感觉我不是最有资格写产业工人经历的人。韩国有很多人曾深入参与到劳工运动之中，他们对劳工解放运动事业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深深卷入其中，并从这一角度写过很多关于劳工运动的书籍和文章。正如本书所谈到的，韩国劳工斗争最突出的方面之一，是大批学

生和知识分子参与到劳工运动之中。这些知识界劳工活动家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已经写过大量有关劳工运动的描述和分析材料。而且，很多工厂工人自己也以作文、诗歌、工会报告和罢工传单等形式写过他们的经验。我想，他们当中很多人比我更有资格就韩国发展进程中的劳工问题进行著述。但是，后来我也意识到，我有能够从远距离和用比较的视角观察韩国经验的优势，而且我能更好地向说英语的听众讲述韩国人的故事。

在我研究的最初阶段，我发现尽管有关韩国劳工运动的资料很充足（大部分是韩文的资料），但有关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却绝对十分稀少，从而使很多有趣的问题没有探讨和没有答案。韩国工人是怎样解释他们在工厂中的体验的？他们怎样意识到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是怎样形成工人这种集体认同的？他们怎样获得工人团结和能代表工人的工会很重要这种明确的意识？在反对独裁主义国家机器的过程中，他们怎样形成高度的政治意识？如果我们想不仅把工人斗争作为一种工会运动来理解，而且作为造就一种有着鲜明阶级认同和意识的集体的过程来理解，那么这些问题就是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在本书中，我展示了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开始到 90 年代末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情况，并从比较的观点分析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韩国劳工斗争和阶级形成的经验，是可供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极有吸引力的案例，能提供很多可以超越目前以欧洲为中心的阶级形成理论的东西。本书是开始这种比较的第一步。

在进行有关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叙述时，我特别关注文化和政治如何给第一代产业工人的体验带来冲击和塑造他们斗争的模式。正如目前有关阶级形成的学术研究普遍接受的那样，社会阶级最终是在工人亲身经历过的体验基础上形成的。但是，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体验并不仅仅是由生产关系形成的，而且还是由文化

和政治权力从外部以及通过内部劳动关系而形成的。在韩国的背景下，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工人亲身经历过的体验是由儒家文化传统和家长制意识形态以及独裁主义国家权力形成的。文化和政治权力曾一起发生作用，压制着韩国产业工人形成新的阶级认同和意识。但与此同时，文化与政治权力协同资本一起压制工人的方式，也导致工人产生强烈的愤恨，导致他们激烈的反抗。韩国工人阶级斗争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文化和权力的双重和矛盾作用，即同时既压制也促进了工人的认同和意识。

本书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完成。一路走来，我欠了许许多多的人情。对于在我研究过程中与我分享他们的体验和高见的很多工人和工会活动家，我要致以最深切的感谢，其中包括：石正南，金志宣，方镛锡，金俊龙，韩明姬，梁盛华（音），查银年（音），金淑子（音），白多礼，朴在九（音），金虎圭，朴俊锡，李相道，金海允，金炯光，金康熙，许东煜，还有几位很遗憾我没有记录下来他们的名字。他们帮助我从人的方面深入了解劳工斗争，教我如何阅读和更好地理解政府、媒体、劳工研究专家和工会方面记下的大量材料。通过几年与他们的交谈，我忍不住在想：他们是多么聪明、诚实和值得尊重的人啊！韩国产业体系以及整个韩国社会对这些值得尊重的人是多么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我真诚地希望这些工人从本书中找到某种慰藉。这将是我对他们教给我很多东西的部分报偿。

我感到很幸运，结识了在 80 年代推动民主工会运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几位学生出身工人，并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其中包括：朴东，李仙株，沈相灯，严仁熙（音），郑光弼，鲁会灿，金虎圭，李秀卿和郑珠银等。作为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勇敢、最无私的人，他们放弃了较舒服的生活和能赚钱的事业，为的是献身平等、正义和民主的事业。我想向现任民主劳动党副主席的鲁

会灿致以特别的感谢，是他与我分享了自己直接知道的有关学生活动家组织所起作用的情况和见解。我还要特别感谢金虎圭和李秀卿，是他们邀请我住在他们位于蔚山现代公司公寓区的家中，使我能够接触到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个人空间。他们还向我介绍了几位很不错的同事和朋友，他们诚恳地与我分享了他们的体验。

要是没有工会、教会组织和其他活动家团体编写的大量文献材料的话，也许我这个项目就无从下手了。我想谢谢所有那些参与编辑这些资料、使它们能够为感兴趣的人所利用的人士。对我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还有韩国劳工研究专家写下的很多信息丰富的分析，他们曾密切关注劳工运动每一天的发展情况。其中有些是匿名作者写的，有些则用了假名字。在很多就韩国劳工运动写过很有价值著作的人当中，我要特地感谢几位通过提出个人建议、通过他们写的著作给我的研究带来巨大帮助的学者。崔章集评论了我最初写的几个部分，让我阅读他未发表的论文，并确认我的努力有其价值，给了我很大帮助。金东椿、林荣一、宋虎根、申光荣，朴濬植很友好地送给我他们新出版的书籍，使我能更好地把握 1987 年以后民主劳工运动的趋势。金炯基和林皓的著作也给了我同样的帮助。他们都是 80 年代活跃的政治活动产生的一批最有思想、最聪明和最投入的学者中的代表。

几位同事阅读了本书的各个部分并做了评论，他们是：拉维·帕拉特，阿里夫·迪尔里克，苏耀昌，约翰·莱，金银美（音），张卿树（音），乔纳桑·戈德伯格－希勒，弗雷德里克·迪约，杨国彬（音），伊丽莎白·佩里，安德鲁·戈登，铃木昭，理查德·博伊德，郭德永（音），南希·阿贝尔曼和伊丽莎白·拉莫吕克斯。我还很赞赏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一位不具名审读者提出的极好评价，并感谢另外两位匿名审读者在另一个场合提出的很有帮助的评论。



我还非常赞赏我在夏威夷大学的两名研究生，特别是那些参加1999年春社会分层研讨班的研究生，他们阅读和批评了本书的初稿。我尤其感谢河希珍（音），她帮助我解决计算机方面的问题和本书中的图表、索引，并对有些章节提出了尖锐批评。高海进（音）、斯蒂拉·霍坎诺和珍妮·金阅读了手稿的各部分并给予了编辑上的帮助。

我要感谢为本人研究不同阶段提供过资金资助的机构：夏威夷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学术振兴财团，东西方中心和亚洲研究基金会。我非常感谢荷兰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所（NIAS），他们邀请我到该研究所担任了一年的客座研究人员，这一年非常愉快。1998～1999年间在NIAS度过的一年时光，使我能完成本书的第一稿并重组其理论框架。我在荷兰见到的最好的人是NIAS编辑安妮·辛普森。她很肯帮忙，打字录入我书稿的各章并做了编辑，我在那里的时候，她甚至乐意在我回美国后仍帮助我处理文字写作方面的事情。

另外几位对我这本书的主题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士也给了我这样那样的帮助。全京子（音）帮我把朴老海（音）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珍妮弗·李应我的请求翻译了工人之歌。郑熙男（音）帮我画了工业地带地图。我还希望表达我对韩国《中央日报（新闻版）》的赞赏，在离开韩国到北美学习之前我在那里当过记者，他们允许我将几张照片用于本书。我也感谢东光出版社允许我使用他们图书中的几张照片，并感谢吴淑熙（音），她允许我使用她兄弟即后来的吴润的两张图画。

我要特别感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负责编辑本书的罗杰·海顿，他长期以来对我有关韩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很感兴趣，并热情支持出版这本书。他可以说是人们可以与之共事的最好的编辑：干脆，高效，彬彬有礼，极富判断能力和幽默感。我还要感谢朱

莉·默尔高超和严格认真的编辑工作，并感谢安格·罗密欧－霍尔对编辑流程反应最及时和审慎的管理。

最后，我感谢我妻子和两个女儿，感谢她们永远的爱和支持。我知道，当她们看到这个旷日持久的项目终于完成时会像我一样愉快。

此时此刻，我还要表达我对母亲和逝去的父亲的永恒感激，感谢他们对儿子无尽的爱和奉献。我要感谢我的姐姐，就像本书中描绘的大多数工厂女工为她们的弟弟妹妹所做的那样，她为了我能受到教育而牺牲了她应得到的教育。我从父母那里——从他们的辛苦工作，自我牺牲，对人友善，复原能力，不断地为改善地位而奋斗，因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而产生的“恨”，等等——得到了很多对这项研究的启示。这些是工厂工人生活中同样经历过的主题。我将本书献给我的母亲并纪念我的父亲。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1
第二章 产业大转型	28
第三章 韩国产业中的工作和权威	57
第四章 殉教者、女工和教会	86
第五章 工人和学生	125
第六章 工人认同和意识	157
第七章 劳工大攻势	193
第八章 处于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	236
参考文献	273
英汉对照索引	308

第一章

绪论：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而当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继承的或分享的）经历，
感觉到并且能表达清楚他们之间的利益的共同性和与另
一些人的利益的不同性（而且通常是对立的）时，阶级
就产生了。

（Thompson 1963, 9）

1997年1月，在巨大的工人抗议浪潮发生十年后，韩国工人由于发动抗议新通过的劳动法而举行的全国性大规模罢工，再一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制定这些有争议的新劳动法，是为了赋予雇主更大的权力，让他们可以解雇工人、雇用临时工和拒绝参加罢工者；同时，在同一工作场所已经建立工会之后的几年内，不允许再组成不同的工会。这场罢工动员了大约300万名工人，使汽车、造船和其他主要行业停产；罢工还打断了电视新闻的播送，中断了医院病房和地铁的服务。尽管季节的因素并不有利——当时正处于新年假期，天气寒冷——但长达三个星期的罢工持续保持了高水平的工人参与度，而且公众的支持度也高得令人吃惊。1月底，在政府不情愿地同意修改新劳动法的情况下，

罢工才宣告结束。

这场总罢工显示了自 1987 年发生大规模劳工骚动浪潮以来韩国劳工组织化已经达到的程度。劳工骚动已经不再是政治动荡时期自发性工人抗议活动导致的结果；工人首先感兴趣的不再是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也不再是向管理者的专制霸道发泄他们感觉受到压制的愤怒情绪。此时工人更关注的是长期的工作稳定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利益，更关注的是法律和制度上的问题而不是企业层面上的问题。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斗争。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国家而不是单个资本家。

由于工作稳定性是核心问题，因此 1997 年 1 月的罢工不仅反映了蓝领工人的利益，而且反映了很多白领工人和从事管理的工作人员利益（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工作稳定性是从事多种职业的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通过争取这种稳定性，有组织劳工承担起了一种新的社会角色：成为人口中不同部分的代表者，捍卫工作职位应有保障、雇用关系应保持公平等人们普遍持有的价值观。

尽管这场总罢工只取得了政策制定者的微小让步，但罢工向全世界表明了韩国工人战斗性的提高。国际上大的报章一致将韩国工人描述为“好斗”、“有进攻性”和“有战斗性”。《洛杉矶时报》（1997 年 1 月 21 日）将韩国劳工运动描述为“以激情和猛烈而举世闻名”，《纽约时报》（1997 年 1 月 17 日）称韩国为“患罢工病的国家”。显然，韩国劳动队伍听话顺从的国家形象已经彻底改变。正如瓦尔登·贝洛和斯蒂芬尼·罗森菲尔德指出，韩国工人阶级“让人们想起了 19 世纪欧洲工人阶级的形象，具有反叛、不妥协、充满激情的阶级意识”（Walden Bello and Stephenie Rosenfeld, 1990: 23）。

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发展。像其他东亚国家的工人一样，韩

国工人直到晚近的时候为止仍以勤劳、守纪和顺从而闻名。由于这个国家有勤劳的劳动队伍，由于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头 25 年间普遍存在高度的“产业和平”，韩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期，劳动纠纷的数量每年很少超过 100 起，其中大多数与一些自我保护性的问题有关，如无端解雇、拖欠工资和无法容忍的工作条件。有过大量报道的一次劳工抗议发生在 1976 年，它显示了工人脆弱的地位。这次抗议是由海大面包公司（Haetai Bakery, Inc.）雇佣的女工组织的，海大面包公司是韩国最大的烤面包工厂，有 2500 名工人。韩国劳动局档案中保存有一份海大公司工人写的请愿书，其中包含以下内容：

请让我们每天只工作 12 个小时。我们被迫每天工作 12 小时以上。我们知道“劳动法”规定 8 小时工作制，但考虑到公司的情况，我们愿意工作到 12 小时。但如果超过 12 小时，对我们来说太难承受了……此外，我们被不时分派连续两班工作，被迫连续多日每天工作 18 小时，忍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痛苦。（Soon Jum-soon 1984, 21~22）

众所周知，韩国工人工作时间极长；事实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每周工作时间之长居世界之最。正如上面这段请愿要求所示，70 年代，对于在劳动密集型经济部门就业的很多工人来说，连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也是迫切要求得到的。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工人默默地忍受着长时间工作的痛苦，而海大工厂这些工人很勇敢，他们组织起了工会，并进行争取缩短工时的斗争。从 70 年代中期起，在服装、纺织和其他出口行业也开始发生类似的斗争；不过，总体来说，韩国劳工仍保持着顺从、无组织和政

治上沉寂的状态。

1996~1997年冬的总罢工和海大工人1976年的斗争发生时间相距只有20年。在这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韩国劳工有了实质性的变化。70年代，韩国工厂工人视10小时和12小时工作日为正常，甚至愿意在只付给小额额外报酬的情况下工作15~18个小时，而90年代后期，在很多大工业公司中工作的蓝领工人则视8小时为正常工作日，不愿意超时工作，除非加班费令人满意。70年代，工资由雇主单方面确定，而90年代后期，则通过劳资之间严肃的谈判来决定。70年代和80年代，劳工斗争首要针对的是过长的工时和非人的工作条件，而90年代，劳工运动的重点是保护工作稳定性和增强劳工的组织力量。

韩国劳动关系中发生这种迅猛变化，原因何在？是什么因素使得韩国一度温顺的劳动大军迅速变成一种具有战斗性的社会力量呢？在形成一种强大而具有进攻性的劳工运动方面，是什么因素使韩国工人比他们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同伴取得大得多的成功呢？这些正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本书讲述了第一代韩国产业工人如何适应无产阶级的工作世界，并且尝试理解他们在新产业中的经验^①。它观察了他们争取组织独立工会的方式，这种斗争的目的是在一种极具剥削性、欺压性的工业生产体系中保护自己。它探索了他们如何形成新的视自己为工人的集体认同，如何在他们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团结的意识。它考察了韩国工人如何形成一种独特的阶级意识，考察了这种阶级意识通过组织方

① 尽管20世纪60年代并非初次出现大量产业工人的时间——领工资工人在20年代殖民地时期就曾经大量出现——但出口导向工业化大规模地产生了新一代工厂工人，其中大多数是直接从事农村录用的，以前没有过领工资就业的经历。从这种意义上说，将这批新的产业无产阶级视为韩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代是适当的。

面的、文化上的、制度方面的活动等多种形态表现出来的方式。简言之，这是一项关于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研究。这也是一项对韩国工业化的研究，只不过研究是从工人的观点而不是从工业家或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进行的。

有关韩国经济发展，已经有了很多的著述，但在讲述这种经济变迁的故事时，几乎都是从发展主义经济学家的视角进行的（例如，参见 Cole and Lyman 1971；Kuznets 1977；Jones and Sakong 1980；Amsden 1989；Steinberg 1989；Song Byung-Nak 1990；Woo 1991；World Bank 1993；Sakong 1993；Cho Soon 1994）。在这些范围极广的文献中，作者的首要关注点是说明韩国和其他东亚小龙（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如何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1997 年的经济危机弱化了东亚经济奇迹的吸引力，引起了人们探索亚洲国家发生这场经济瓦解的原因。然而，韩国经济从危机中恢复的比所有经济学家预测的都要快，因此长期以来围绕韩国经济异乎寻常的表现这个问题展开的争论有可能仍将继续下去。

不管这种争论关注的是韩国经济奇迹还是那场金融危机，争论时非常明显的欠缺都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千百万工作着的男男女女，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使得这种壮观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关注。有关东亚奇迹的讲述，很多说的都是发展主义国家的作用、市场机制、促进增长的制度和儒家文化的抽象观念，而很少谈及工人和他们的具体体验。这并不一定是由于经济学家没有承认劳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显然承认，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s）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依赖于低工资、辛勤工作的劳动队伍。他们同意，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大量廉价、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关键原因。尽管承认了

这一点，但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很少不是将劳工仅仅视为一种生产要素或比较优势要素。他们关注的不是从事劳动的人们作为人的体验，而是作为国家经济竞争基础的劳动队伍的工资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如果说发展主义经济学家曾经关注过经济发展给工人带来的社会后果，那么他们很大程度上也是将自己的分析仅仅限于工资和收入分配等问题。人们注意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与相对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被称赞为“平等的增长”的实例（World Bank 1993）。韩国收入分配的记录比不上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要好很多。韩国工人工资增加的速度属于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工资的迅速提高，削弱了韩国企业的竞争力。

因此，非常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如此之多的工人，对曾经给他们的生活水平带来如此迅猛提高的经济制度存在这样大的不满呢？相对被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这种众所周知的现象，即人们对自己经济改善的预期升高的速度超过了经济上的实际改善速度，必定起到了某种作用。不过，一个远远重要得多的因素是，工人在工厂中的日常体验是：自己是受到重度剥削、受到欺凌的劳动者。在韩国工厂工人中酿成如此大的愤恨、造成韩国兴起强大工人运动的因素，与其说是收入增长的迟滞，不如说是在工作中受到残酷对待的体验。

有关东亚发展的文献甚少关注劳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工在发展中发挥着很被动和顺从的角色。在所有东亚四小龙中，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之前，禁止动员劳工和从政治上控制劳工的做法已经得到很好的实施。纵贯整个出口带动的快速工业化时期，他们被置于严密的国家控制之下。在这方面，可以看到东

亚与拉丁美洲之间存在鲜明的对照。在 20 世纪最初几十年里，拉美劳工已经在政治舞台上显示出强大力量，即使是他们在很多国家被纳入到某种合作主义体系之中后，劳工在政治制度的演化中仍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鲁思·柯里耶和戴维·柯里耶 (Collier and Collier, 1991) 认为，劳工被纳入合作主义体系的方式，决定了 20 世纪下半叶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轨迹 (另见 Bergquist 198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的时期内，东亚小龙中也发生过对劳工的政治动员，但左翼劳工因出现强大的反共国家机器而被完全摧毁，劳工没有留下任何组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点。鲁思·柯里耶和戴维·柯里耶指出，拉丁美洲政治精英则继续遇到“二重性的两难”：一方面要控制组织化的劳工，另一方面又要寻求得到影响巨大的劳工团体的支持 (1991, 48~50)。这种两难在东亚从未存在。劳工一直是控制和排斥的对象，从未被视为主要的政治同盟者或选民。由于没有历史遗留的组织，没有来自政党的支持，亚洲小龙的劳动大军被作为原子化的工人纳入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进程中。他们辛勤工作，很少向雇主提出要求，对实施国家的发展政策没有构成任何重大挑战。

因此，有关东亚劳工的著述中的主导性主题便是劳工的顺从性、其组织方面的弱点及其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情形。在惟一一部对东亚劳工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的著作中，弗雷德里克·迪约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劳工的决定性特征描述如下：“在国家事务中，组织化劳工在政治上只起到边缘性的、无关紧要的作用。在集体性讨价还价中，劳工在雇主面前处在弱小的地位，产业中罢工的情况很少，而且普遍很容易被压制下去。劳工对经济决策的参与，最多只是象征性的” (Deyo 1989, 3~4)。他进而注意到，“快速、持续的工业化并没有改变劳工弱小的政治地

位”，而且，“尽管三十年来形成了庞大的工厂工作队伍，但劳工运动总的来说仍受到控制，仍是无关紧要的”（4~5）。

因此，有关东亚劳工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是劳工的被动性及其政治上的沉寂。是什么原因造成东亚劳工的这种独特性呢？迪约（1989，5~6）指出了对东亚国家经济中劳工沉寂的三种流行解释。最经常提到的解释是文化上的：儒家文化及其重视等级制、尊重权威、合作、勤劳、家族主义等，被普遍认为起到了鼓励工人服从和与管理者合作的作用，而且对工人的团结和集体行动起到劝阻作用。情况确实是，日本和四小龙的工业家有意识地利用儒家传统来营造劳动冲突比大多数西方工业化社会少得多的工业体系。在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组织中，工业权威通常呈现出家长制或族长制的形态，家族主义的思想常常被利用来确保工人服从并承诺实现公司目标。

第二种解释是经济上的：东亚小龙的快速经济增长大大提高了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准。工作职位市场的情况得到了持续的改善，工资水平和其他报酬的水平也是如此。人们认为，尽管工人的组织和集体行动被压制，但生活水准的这种大幅度改善削弱了工人对作为一种向上流社会流动途径的集体行动的兴趣。在这种持续增长的经济和不断扩大的工作职位市场中，工人能够寻找到个人升迁的办法，对参加工会兴趣甚少，当这样做意味着很大的个人风险时尤其如此。

第三种解释强调国家的作用。众所周知，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国家机器”异常强大并独立于其他社会集团。它们拥有着分布广泛的社会控制机构，并随时准备好运用这些机构来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国家机构精英已经将经济增长确定为政权合法性的主要基础，并将自主的劳工组织视为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尽管控制劳工的形式在东亚小龙中各不